

后危机时代下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陈 伟 国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成都 610021)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采取以政府支出为主导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财政支出效率受到广泛的质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我国新时期财政政策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为基本模型构建了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框架,并对我国 1978—2008 年各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4-0120-05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经济波动加剧,以政府支出为主导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成为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但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因此在政策实践上有时会受到质疑。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财政支出效率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使财政支出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以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是新时期财政政策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的重要任务。

一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早在 19 世纪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税收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上面。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Solow 认为,相对储蓄率和物质资本而言,税收和财政支出更能影响稳定的增长率^[1]。Arrow 和 Kurz 认为,政府支出都具有生产性,只会影响到暂时性的经济增长率,而不会对稳态经济增长率产生任何影响^[2]。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财政支出结构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Barro 把公共部门引入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AK”生产函数中,建立了一个以政府支出为中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了一个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他把政府支出分为政府投资与政府消费支出,认为政府投资会形成资本存量,由于政府投资的存在,使经济产生持续的增长成为可能,政府消费支出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但能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3]。Easterly 和 Rebelo 则通过跨国回归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加大对生产性支出中的交通和通信设施的公共投资,将会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4]。但是一些经验的实证性研究认为,在政府支出结构中,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或具有负相关性。Devarajan、Swaroop 和 Zou 在重新对生产性支出做出界定后,对 43 个发展中国家 1970—1990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传统的生产性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非生产性支出却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且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支出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Agell 等对 1970—1995 年 OECD 国家

收稿日期:2011-04-12

作者简介:陈伟国(1976—),男,湖南邵阳人,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分析。

的公共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共部门规模的膨胀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6]。Toye认为,政府在减少财政支出时的随意调整,会造成公共服务水平的降低和生产力的扭曲,良好的基础设施(交通、通讯、电力)和社会服务部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对经济有很好的预期作用,应当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保障对象^[7]。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相关理论成果的发展基础上,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龚六堂、邹恒甫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8]。郭庆旺等研究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9]。欧阳志刚采用联立方程组估计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在1993—1997年间,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下降趋势,1998年以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步上升^[10]。廖楚晖、余可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阵估计法(GMM)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与地区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有密切的相关关系,但一些地方生产性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并不具有促进作用^[11]。陈仲常、李郁梅利用1995—2005年省级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甚至出现结构失衡现象,有必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以促进经济增长^[12]。

二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1. 模型构建

笔者以Barro模型为基础,分析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思路。

(1) 生产函数

现在我们引入公共部门,假设G代表政府支出,公共服务在私人生产中具有生产性投入作用,生产具有不变规模收益,并且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程式为:

$$Y = AK^\alpha [LG]^{1-\alpha} \quad (1)$$

在(1)式两边同时除以L,得:

$$y = Ak^\alpha g^{1-\alpha} \quad (2)$$

(2) 家庭部门

假定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u(c) = \frac{c^{1-\sigma} - 1}{1-\sigma} > 0 \quad (3)$$

具有拉姆齐偏好的代表无限生命的居民寻求终生效用最大化的函数为:

$$U = \int_0^{\infty} u(c) e^{-\rho t} dt \quad (4)$$

家庭预算约束为:

$$\kappa = (1 - \tau)y - c \quad (5)$$

其中,c是人均消费,p是不变的时间偏好率,人口不变且瞬时效用函数为u(c),σ为边际效用弹性。k为人均资本存量,y是生产函数,τ为税率。

(3) 企业部门

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利润函数为:

$$\pi = (1 - \tau)y - rk - wl \quad (6)$$

其中,r是资本利息率,w是工资率,l是劳动力,利润最大化时:

$$r = \alpha(1 - \tau)Ak^{\alpha-1}g^{1-\alpha} \quad (7)$$

(4) 政府部门

假定政府执行平衡预算,财政支出来源于对产出y按税率τ征收的税收:

$$g = \tau y = T \tag{8}$$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追求自己效用最大化就是在现有的预算约束下选择自己的最优消费路径,我们利用汉密尔顿函数来实现最优化,其 Hamilton 方程如下:

$$H = u(c) + \mu[(1 - \tau)Ak^\alpha g^{1-\alpha} - c] \tag{9}$$

这样,最优化条件、欧拉方程和横截面条件分别为:

$$\begin{aligned} \partial H / \partial c &= u(c) - \mu = 0 \\ \dot{\mu} &= \rho\mu - \partial H / \partial k \\ \lim_{t \rightarrow \infty} \mu(t)k(t)e^{-\rho t} &= 0 \end{aligned}$$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消费最优增长率:

$$\dot{c}/c = [\alpha(1 - \tau)Ak^{\alpha-1}g^{1-\alpha} - \rho]/\sigma \tag{10}$$

在稳态条件下,消费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也与资本增长率相同,即:

$$\dot{c}/c = \dot{y}/y = \dot{k}/k[\alpha(1 - \tau)Ak^{\alpha-1}g^{1-\alpha} - \rho]/\sigma \tag{11}$$

为了把财政支出项目具体化,我们令 $1 - \alpha = \varphi = \varphi_1 + \varphi_2 + \varphi_3 \cdots + \varphi_n$, 财政支出由各个部分组成,分别表示为 $g_1, g_2, g_3 \cdots g_n$, 并且 $g_1 = \theta_1 g \cdot g_2 = \theta_2 g \cdot g_3 = \theta_3 g \cdots g_n = \theta_n g$ 。

则最优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率转化为:

$$\dot{c}/c = \dot{y}/y = [\alpha(1 - \tau)Ak^{\alpha-1}g_1^{\varphi_1}g_2^{\varphi_2}g_3^{\varphi_3} \cdots g_n^{\varphi_n} - \rho]/\sigma \tag{12}$$

再把(12)式转换一下:

$$\dot{c}/c = \dot{y}/y = [\alpha(1 - \tau)Ak^{\alpha-1}(\theta_1 g)^{\varphi_1}(\theta_2 g)^{\varphi_2} \cdots (\theta_n g)^{\varphi_n} - \rho]/\sigma \tag{13}$$

通过拉格朗日方程,求解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财政最优支出结构,即:

$$\begin{aligned} \Gamma &= [\alpha(1 - \tau)Ak^{\alpha-1}(\theta_1 g)^{\varphi_1}(\theta_2 g)^{\varphi_2}(\theta_3 g)^{\varphi_3} \cdots (\theta_n g)^{\varphi_n} - \rho]/\sigma + \lambda[1 - \sum_{i=1}^n \theta_i] \\ \partial \Gamma / \partial \theta_i &= 0 \quad i = 1, 2, 3 \cdots n \end{aligned} \tag{14}$$

从而得出:

$$\begin{aligned} \theta_1^* &= \varphi_1 / 1 - \alpha, \\ \theta_2^* &= \varphi_2 / 1 - \alpha, \cdots \\ \theta_n^* &= \varphi_n / 1 - \alpha. \end{aligned} \tag{15}$$

由此可见,当经济增长达到最优时,各项财政支出的比例为各项财政支出弹性和总财政支出弹性之比,如果财政支出比例偏离最优比值,经济增长不可能达到最优。也就是说,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财政支出中各项支出的弹性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也不相同。所以,当经济面临新情况和新的条件时,我们应根据财政各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动态调整财政支出去扭转局部结构性失衡矛盾,以便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2. 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直接对生产函数进行对数线性化,回归方程如下:

$$\ln y = \ln A + \gamma \ln k + \beta_2 \ln g_2 + \beta_3 \ln g_3 + \cdots + \beta_n \ln g_n \tag{16}$$

进一步整理得:

$$\ln y = \beta_0 + \gamma \ln k + \beta_1 \ln g_1 + \beta_2 \ln g_2 + \beta_3 \ln g_3 + \cdots + \beta_n \ln g_n + \epsilon \tag{17}$$

其中, y 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k 代表人均私人投资, g_1 代表基础建设支出, g_2 代表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g_3 代表各项农业支出, g_4 代表科教文卫支出, g_5 代表社会保障支出, g_6 代表国防支出, g_7 代表行政管理支出, ϵ 为残差。

本文以 1978—2009 年我国财政支出时间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影响做实证分析,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分析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3.175730	0.620253	5.120054	0.0001
log(g1)	-0.139633	0.057292	-2.437224	0.0243
log(g2)	0.002116	0.096060	0.022033	0.9826
log(g3)	-0.092059	0.118996	-0.773630	0.4482
log(g4)	-0.176218	0.282211	-0.624418	0.5394
log(g5)	0.189746	0.047859	3.964711	0.0008
log(g6)	-0.016305	0.114228	-0.142739	0.8879
log(g7)	0.058989	0.232981	0.253192	0.8027
log(k)	0.926489	0.119626	7.744907	0.0000
R-squared	0.999209	Mean dependent var		10.24721
Adjusted R-squared	0.998892	S. D. dependent var		1.326864
S. E. of regression	0.044162	Akaike info criterion		-3.152764
Sum squared resid	0.039006	Schwarz criterion		-2.728431
Durbin-Watson stat	1.464424	Prob(F-statistic)		0.000000

从回归结果来看,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私人投资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增长0.926%;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基础建设支出增长1%,经济增长率降低0.14%,这说明基础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减弱,尤其是大型投资项目可能存在挤出效应或效率问题;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社会保障支出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增长0.19%,这说明社会保障对老百姓生活非常重要,无论从投资和消费来看,都起到了良好的预期。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统计不显著,效应不明显。支农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值得关注。

三 结论与政策启示

根据实证结果分析,如果以实现经济长期稳态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为标准的话,那么我国现行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负作用,说明我国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重大项目投资过高,没有发挥其良好效应,应该减缓政府公共投资过高的态势,大力引导私人投资,提升投资效率。企业挖潜改造支出虽然作用不显著,但对于经济和技术落后的地区或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证结果出现负效应,并不是由于农业支出过多,而是由于农业投入很少且产出弹性也很小造成的。科教文卫支出一般而言对经济增长会有很大促进作用,但是结果不如意,主要原因是我国科教文卫支出重心不是在科研上面,而是在基本事务费用方面,因此应该改善其内部结构。加强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就业政策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收入水平,增加投资与消费功能。国防支出过高会对经济增长有反作用,因为在其他经济建设方面资源分配不多。地方行政管理费用虽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是过高的管理费用会造成对经济过多的干预,所以不应过高增加政府行政管理费用。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寻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路径,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项目采取有保有压的调整措施。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效应在减弱,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改善。对那些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项目,不应过度超前规划,实施大投资,比如有些地方加速修建高铁、支线机场,就造成财政支出的低效率。财政支出更应该投入老、少、边、穷的基础设施上,为它们创造发展的基本条件。另外,财政支出应加大力度支持农业水利设施、电力改造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

第二,按照公共财政要求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竞争性领域的投入,把财力集中转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面来,尤其是科技和教育方面,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根据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以及节约原则,减少政府行政性支出,尤其是政府公务消费和接待。教育是培育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大对教育投入,扩大教育支出的覆盖面,尽快推行教育公平化,延长九年义务教育,在财力许可的范围把幼儿教育 and 高中教育纳入进来。设立专项教育扶贫基金,关注农民工子女、弱势群体的子女教育问题,提升国民总体素质。加强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对那些有市场前景、技术含量高的科技攻关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对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和发明创造提供财政补贴,以发挥科技对经济的强大支撑作用。

第三,财政要进一步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保障民众投资和消费的安全感。社会保障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医疗、养老、失业得到了保证,民众才拥有良好的心理预期,敢于花钱,有效促进消费的良性循环。一是要加强城镇医疗制度改革,对医药企业、大型医院基本服务实施政府补贴,进一步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二是要增加养老保险的支出比例,同时为失业人员提供技能培训,为低收入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的支出,提升民众消费能力。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部分,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第四,加强农业支出,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经济发展夯实坚定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财政支出偏向农业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农业生产基地,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实施好粮食收购政策,落实好农药、化肥、种子、农用机械等惠农政策,发掘农村的消费能力,以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1(1).
- [2]Arrow K J, M Kurz.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1970.
- [3]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103-125.
- [4]W Easterly, S Rebelo.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32(3):23-27.
- [5]Shantayanan Devarajan, Vingya Swaroop, Heng-fu Zou.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37):313-344.
- [6]Jonas Agell, Thomas Lindh, Henry Ohlsson. Growth and Public Sector: A Reply[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5(2):359-366.
- [7]John Toye. Fiscal Crisis and Fiscal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24): 21-44.
- [8]龚六堂,邹恒甫. 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学动态*,2001,(9):58-63.
- [9]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11):5-12.
- [10]欧阳志刚. 我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经验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5):5-10.
- [11]廖楚晖,余可.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2006,(11):41-45.
- [12]陈仲常,李郁梅.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优化模型—基于我国各省、市面板数据分析[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6):48-53.

[责任编辑:刘萍萍]